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解读

这笔“人口账”怎么看？

如何解决好“一老一小”等问题将是未来需要持续关注的重点

算清“人口账”有助于准确把握我国当前人口发展变化的趋势,辩证看待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更能为今后高质量发展布棋落子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当前全国总人口 14 亿多、劳动年龄人口为 8.8 亿人、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 2010 年的 9.67 年提高至目前的 10.75 年……这些最新数据表明,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口众

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将长期存在,一支高素质的劳动者大军依然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大优势之一。

然而也要看到,人口结构中挑战与机遇并存。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劳动年龄人口逐年缓慢减少、人口与资源环境仍将处于紧平衡状态等,这些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

情。如何将“人口红利”尽快转化为“人才红利”、如何解决好“一老一小”问题、如何处理好不断增大的就业压力、适应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这都是未来需要持续关注的重点。

人口问题是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问题,辩证看待人口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科学制定应对措施,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人口结构和素质,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养孩

2020年总和生育率1.3 人口负增长要来了吗？

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尤其是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人口生育观念转变等方面的影响,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总和生育率较低 但政策因素带来千万“二孩”

“随着‘单独二孩’‘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出生人口数量快速回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生育政策调整成效积极。2016 年和 2017 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 1800 万人和 1700 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 200 多万人和 100 多万人。从生育孩次看,2014 至 2017 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明显上升,由 2013 年的 30%左右上升到 2017 年的 50%左右;此后虽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 40%。由于生育政策调整的因素,全国多出生“二孩”数量达 1000 多万人。

宁吉喆说,2018 年以来出生人口的数量有所回落。初步汇总的结果显示,2020 年我国出生人口为 1200 万人,这个规模仍然不小。

宁吉喆说,数据表明,2020 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 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这主要受到育龄妇女数量持续减少、“二孩”效应逐步减弱的影响。从 2020 年来看,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生活的不确定性和对住院分娩的担忧,进一步降低了居民生育的意愿。

前段时间,民政部部长李纪恒撰文表示,受多方影响,我国适龄人口生育意愿偏低,总和生育率已跌破警戒线,人口发展进入关键转折期。

宁吉喆在 5 月 11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人口会在未来达到一个峰值,但负增长时间的到来还存在不确定性。”

人口负增长将在什么时候到来?从数据趋势看,近几年我国每年死亡人口在 1000 万左右,排除其他因素,当出生人口低于 1000 万,就需要注意了。

愿意生孩子的为什么少了？ 生养成本高 生了没人管 生育年龄与职业发展有冲突

宁吉喆认为,生育水平的高低既受政策因素的影响,也受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在逐步增强。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人们不愿意生孩子,从各个调查反映的信息来看大概有这样几类——生育养育成本过高、生了孩子以后没人管、晚婚晚育现象越来越普遍、生育年龄与职业发展有冲突。

首先是生育养育成本过高。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不断上升的过程。

其次是生了孩子以后没人管。中国目前实质上 50%—70%的小孩都是由上一代老人帮着带,也就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帮着带,但是公立的托儿所和幼

儿园还明显不足,特别是公立托儿所几乎是空缺的。

第三是晚婚晚育现象越来越普遍。一般来说,现在农村的初婚年龄都是二十五六岁,城市的初婚年龄都在二十六七岁了,这时生第一个孩子一般都三十岁左右了。如果再生第二个孩子、第三个孩子,那年龄就更大了。从医学角度来看,大龄孕产妇往往是高危孕产妇,对其本身的健康和胎儿的健康都有影响,这也是造成一部分不愿意生孩子的原因。

第四是生育年龄与职业发展有冲突。一般来说,30—40 岁是人们职业发展的重要时期,养孩子的时间成本会跟职场发展产生冲突,这显然也是影响人们生孩子的重要原因。

如何激发生育潜力？ 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释放生育政策潜力

原新认为,未来想提振生育率,应该从降低生育成本上下功夫。我们现在都说,将来的孩子是昂贵的孩子。在一个阶段,生育成本是相对固定的,但是能不能在生育成本中相对降低家庭的支付,让政府和社会承担的比例增加一些呢?

再比如说,年轻父母们觉得孩子没人带,那么现在就要加紧做一老一少的工作。老,就是老年服务体系,让老年人能够安养,少,则还要加强婴幼儿的照顾,加强公立婴幼儿机构的建设。“我一直强调它是公立的,因为它是政府和社会的责任。”

此外,还应该倡导适度、适龄婚配,不要再过度强调晚婚晚育。最后,还希望

如何应对

总和生育率较低 家庭越来越小 老龄化进一步加深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结果 11 日发布。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说,低生育已经成为大多数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也将成为我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同时,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 2.62 人,比 2010 年减少 0.48 人。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人,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生育率持续走低的话,家庭的少子化、小型化,家庭关系的简约化等特征会越来越突出,人口老龄化一定还会继续加剧。

——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

家庭

平均每户 2.62 人说明什么？ 无论养老还是育儿 都需要更多社会政策支持

普查结果显示,全国共有家庭户 49416 万户,家庭户人口为 129281 万人。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为 2.62 人,比 2010 年减少 0.48 人。

“家庭户规模继续缩小,主要是受我国人口流动日趋频繁和住房条件改善以及年轻人婚后独立居住等因素的影响。”宁吉喆说。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表示,家庭户规模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资源配置影响很大。我国从传统的几代人大家庭逐步发展为更多小家庭,无论对养老还是育儿来说,代际家庭支持功能将弱化,也意味着需要更多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政策支持。



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当你老了 谁来养你？

普查结果显示,我国 0 至 14 岁人口为 25338 万人,占 17.95%;15 至 59 岁人口为 89438 万人,占 63.35%;60 岁及以上人口为 26402 万人,占 18.70%。其中,65 岁及以上人口为 19064 万人,占 13.50%。

与 2010 年相比,0 至 14 岁、60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分别上升 1.35 和 5.44 个百分点。人口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将持续面临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压力。

60—69 岁低龄老年人 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

民政部此前预测,“十四五”时期,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 3 亿,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表示,人口老龄化主要呈现老年人口规模庞大、老龄化进程明显加快、老龄化水平城乡差异明显、老年人口质量不断提高等特点。

宁吉喆表示,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这既是挑战也存在机

遇。比如,人口老龄化从挑战方面看,将减少劳动力的供给数量,增加家庭养老负担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同时也要看到人口老龄化促进了“银发经济”发展,扩大了老年产品和服务消费,还有利于推动技术进步。这都带来一些新的机遇。

“在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中,60—69 岁的低龄老年人口占 55.83%,这些低龄老年人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身体状况还可以,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宁吉喆称。

养老保险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资产管理行业参与其中大有可为

随着老龄化进程加快,老年人群面临着财富可持续性的挑战。

“未来,要靠自己养自己。”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日前在 2021 光大年度投资论坛上表示,我国老年人口比重上升,为积极应对这一挑战,我们或许要“边富边老”。

近日,中国光大银行与波士顿咨询公司(BCG)联合发布《中国资产管理市场 2020》报告指出,目前,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养老金金融体系在总量和结构上存在显著短板。

“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是一个‘三支柱’体系。”中国光大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付万军表示,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支柱是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第三支柱包括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和商业养老保险。

付万军表示,人口老龄化已经对以

养老第一支柱为主的养老金支付体系提出了挑战,急需第二、第三支柱促进养老保险制度的持续发展。我国第三支柱养老保险市场发展空间巨大,资产管理行业参与其中大有可为。

根据相关机构测算,截至 2025 年末,我国养老资金规模或将达到 203 万亿元,未来五年的年均复合增速约为 10%。

“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一大变化,就是老年人要靠自己做财富管理,为自己积累资产,保证自己老了以后有比较舒适的生活。”光大银行资产管理部总经理、光大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潘东表示。

“老年人在进行财富管理时,往往希望有稳定的回报,并且在市场好的时候,还能取得一定的收益。”潘东表示,他们希望自己的财富和未来的养老生活相匹配。

少子化+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中小微企业或面临很大压力 但未来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

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在老龄化的同时,我们还面临着少子化。老龄化与少子化,累积带来的结果就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在减少。从 2012 年到 2019 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减少了 2600 万,平均每年减少 300 多万。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反映到经济上就是劳动力成本在上涨,直接推动企业生产成本上涨,这会给企业带来很大压力,特别是中小微企业。

对一些产能过剩的领域来说,一方面销售价格上不去,另一方面成本价格在上涨,企业经营十分困难。我们现在有相当数量的小微企业不赚钱,甚至亏损,这和劳动力成本急剧上涨有直接关系。

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了向东南亚新兴国家转移的趋势,这些国家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

当然,我们也不必悲观。新兴国家劳动力成本虽然低,但是它的产业链供应

链是不健全的。我们现在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六稳”“六保”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保供应链产业链。同时,中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我们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和强大的内需潜力,这是不可比拟的。

今年我国高校毕业生达到 909 万,创下新高,在读博士生达到 25 万。在人口增长率下降的情况下,受教育群体在增长。

宁吉喆称,我国人口红利继续存在,面对劳动年龄人口增速放缓的实际,经济结构需要调整适应。未来人才红利新的优势将逐步显现。

同时,普查结果还显示,我国 16 至 59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8.8 亿人,我国人口平均年龄为 38.8 岁。

宁吉喆表示,总的看,劳动力人口资源仍然充沛,年富力强。美国最近公布了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平均年龄是 38 岁,和我国的水平差不多。